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下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教·研·参·考

求实出版社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下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求实出版社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下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

求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印张 288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231·78 定价 1.15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第二编 斯大林主义的极盛时期

第五章 革命与势力范围	(1)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2)
失败了的革命 (法国)	(10)
失败了的革命 (意大利)	(35)
未经允许的革命：对法、意 机会主义的批评.....	(59)
从“大同盟”到“两个阵营”	(75)
疑问与推测.....	(116)
第六章 共产党情报局	(156)
卫星国的革命.....	(156)
共产党情报局与苏联的“新策略”	(164)
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撤退.....	(171)
第七章 南斯拉夫打破缺口	(179)
官行警察专政在卫星国的建立.....	(179)
离经叛道的革命.....	(185)
审判.....	(210)
西方共产党的反铁托主义运动.....	(229)
第八章 东方接替	(252)

中国革命与“大同盟”	(254)
革命战争还是“全国统一”？	(259)
中国“铁托主义”的幽灵	(263)
中苏同盟	(268)
第九章 新的世界均势	(280)
“和平战士”	(280)
“冷战”中的僵持	(289)
对共产党情报局时期的评价	(292)
结束语	(304)

第二编 斯大林主义的极盛时期

第五章 革命与势力范围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斯大林

1925年

* 引文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62—363页。引用者把原文秩序颠倒了一下，把原文中第一段变成了第三段。——译者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从解散共产国际到建立共产党情报局^{〔1〕}之间的四个年头，是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大战的主要战场——欧洲和亚洲。到1945年底，在这个刚刚经历了巨大动荡的世界上，在苏联国界之外有1,400万有组织的共产党人，而在战争前夕至多有100万人，在苏德条约期间还要少得多（虽然不能举出一个确切数字，但党员人数下降是很厉害的，特别是在欧洲）。^{〔2〕}在这次普遍增长中，有些党显得很突出，只有美国是显著的例外。这些党日后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除苏联党（近年还有越南党和古巴党）之外的一些敏感点。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

中共党员人数在抗日战争时期，由1937年的4万人增加到1945年的120万人，从而巩固了它作为伟大的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到1947年底，它已拥有党员170万人，就在同年夏季，大约比斯大林决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间略早一点，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国民党转入战略进攻。内战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地平线上已升起了革命胜利的曙光。^{〔3〕}

大战刚爆发的时候，在后来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所有共产党都是秘密进行活动的。除捷克党之外，它们的生存多年来一直是岌岌可危的，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缩减到只有几千个党员。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波兰党几乎被三十年代后期斯大林的清洗和镇压毁掉了，这种清洗同样也损害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党，虽然程度稍轻一点。可是，到1947年，这些党的党员人数加起来却已超过了700万，政权或者已由它们掌握，或者已是伸手可及了。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法国和意大利的党是两个主要的

党。1943年，意共党员人数为5千人，1946年一跃而达200万人。法共则以较为平缓的速度增加，大战爆发时为30万人（其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在苏德条约期间保留下来），1946年约有100万人。这两个党都已成为工人阶级中举足轻重的大党，而且把它们的影响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界。它们都参加了1947年解放后的政府。

其他一些党在人数增长，尤其在政治影响方面，赶不上刚才提到的这种水平，但也有些情况值得一提：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的七个欧洲小国中（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共产党党员总数由大战爆发时的不到10万人增至1946—47年的大约60万人。甚至连历来就很小的英国党，1939年党员人数总共不过18,000人，到1944年也达到了5万人。^{〔4〕}奥、芬、比、丹、挪等国的共产党还参加了战后初期的政府。

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党员1935年为17500人，1945年为72500人），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是由于英国远征军最后在1944年12月进行干涉（这是同年10月斯大林丘吉尔签订的秘密协定所认可的），^{〔5〕}革命才未能取得胜利。1946年，希共又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到1947年的最后几个月，也就是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同时，这场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西班牙共产党也在法西斯恐怖下重新建立起来，并支撑着一场强大的游击运动。

在亚洲，印度共产党党员人数从1943年的16000人增至1948年的9万人。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就已被打入地下，受到残酷迫害，最多只有1千名有组织的党员，而在1946年却赢得200万张选票和5个议员席位，1949年赢得300万张选票和35个议员席位（缺党员人数的统计）。差不多在所有亚洲国家都可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些规模不大的共产党小组发展起来了，在没有建党的地方建立了党。越南共产党开始进行它的英雄的战斗。在一些中东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共产党的影响也以较小的规模扩展着。伊朗共产党在1946年

曾经短期参加过政府。

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党，在1939年总共只有党员9万人，到1947年差不多已接近50万。其中最突出的是巴西、智利、古巴的党，它们的党员人数在1945—47年间大约分别为20万、6万、4万。智利、古巴共产党有个时期曾经参加过政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巴西党特别寄予厚望。“巴西也许不久就会成为美洲的俄罗斯”。这是当时大家爱说的一句口头禅。

前面已经说过，在战后最初几年中，美国算是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外。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超级强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难于渗透的。1944年，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决定把该党改组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并准备“谋求合作来确保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行”。仅在这时，小小的美共才有过一次暂短的迅速发展。^{〔6〕}不过，即使在美国，虽然在共产党内发生了危机，而在劳工运动中却可以看到一种稍向左转的变化。尽管劳联拒绝参加建立世界工联，但美国无产阶级的另一个庞大的工会集团——产联，却和苏联以及其他一些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集团一道参加了世界工联。

工会的一国规模的团结广泛地恢复了；随着1945年2月世界工联的建立，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工会的世界规模的团结也第一次得以实现。劳工运动激进化的另一个标志，是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势力的增长和赞成同共产党采取共同行动的倾向的加强。

在劳工运动力量和共产党组织得到发展的这个世界性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十月革命所诞生的这个国家和社会，它现在又获得了新的威望。苏维埃制度彻底驳倒了托洛茨基的悲观预言，它经受住了巨大的考验，变得更加强大了。全世界舆论一致承认苏联对击败希特勒帝国主义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苏联的军事胜利对各大洲的工人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和十月革命当年那种震撼世界的影响媲美。但也有一个差别。现在，苏联的形象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典型的体现，它对于与共产主义相距甚远的广大的社会

阶层来说，已经成为维护一切进步事业、民族独立和国家之间和平的至高无上的旗手。各国共产党从苏联这种重新恢复并继续增长的威望中得到好处。除了它们自己在反对纳粹占领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外，这也是它们能够在这时期中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共产党人以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最激进的工人运动团体，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充满欢欣鼓舞的乐观主义精神。苏联所显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军事力量，使他们增添了对社会主义斗争必然胜利的无限信心，不论在采取武装斗争形式的国家也好（如中国、希腊），在依靠苏联红军的保护而取得进展的国家也好（如东欧各国），或者在似乎是要走另一条新的道路，即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机器来夺取国家政权的国家也好（如法国、意大利），情况都是这样。共产党人都深信，任何革命斗争，不管是武装的还是和平的，都一定会得到这个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堡垒”的坚决支持。诚然，英美合伙干涉希腊起义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确实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但这支不和谐的插曲还不足以使整个局面黯然失色。大家都了解，南斯拉夫正在帮助希共，而又有谁怀疑站在南斯拉夫背后撑腰的是伟大的苏联呢？国际反动派的一片叫嚣，不也正是如此说的吗？

总之，世界革命在经过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的挫折之后，似乎又以不可阻挡之势重新跨上了自己的征程。诚然，它暂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又一次停步不前了（不包括捷克和东德这一小块东方区域）。它所走的道路，又一次和马克思所描述的不相符。但是，难道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那种惊人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内和工人运动内的左翼倾向的继续增强，以及英国工党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所有这些不都是社会主义即将闯入资本主义的摇篮的征兆吗？范登堡听到丘吉尔在大选中失败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道：

“据我看，世界都在朝左走哩！”（7）

共产主义在这些年中所取得的真正的或者说明显的成功，自然

有助于使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袖们出于辩解而作的关于共产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得到大发展的描述变得似乎有理了。托洛茨基提出的批评看来已经彻底破产了。面对着苏联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所表现的强大生命力、英雄主义和战斗素质，谁还能相信苏维埃制度是腐朽堕落的官僚主义制度呢？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战略含义、关于苏共的世界领导作用、关于在任何共产党内必须保持磐石般团结的结构作为提高战斗效率的最重要条件，难道所有这些原理以及其他一些在共产国际时期所信奉的原理没有被“历史的判决”所充分证实吗？难道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举行莫斯科审判，树立斯大林式镇压的先例，签订苏德条约，强使革命运动系统地屈从于一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把共产国际当作祭品奉献给“大同盟”，所有这些不都是天才的斯大林英明地阐述了的“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吗？苏军胜利具有解放的含义，这就足以把渗透于斯大林整个世界政策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掩盖起来了。

对于斯大林的论点和决策的这种经验主义的“肯定”，给在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共产党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肯定，在意识形态下面给老一辈共产党员提供了新的证据，使他们又可以成功地说明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正确的，从而加强了他们在“世界党”时期所养成的那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而且这也便于使新党员迅速为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所同化，把传给他们的遗产当作公理接受下来。这样，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国际中形成的那种缺乏批判精神的教条主义精神状态，就传给了新一代的党员，而这些新党员如前引数字所示，构成了1945年以后各个党的绝大多数。整个世界已在进入原子时代。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殖民地的解放、新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会提出许多新问题来。可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却从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来年间那样贫乏。在这段时期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化达到了最高峰。斯大林被神化了，《联

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共产党员的圣经。做一个好党员，无须用心去钻研马列著作，因为斯大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出来，把一切真正需要了解的东西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写进了这本小书里面，使所有的人们，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能够心明眼亮地沿着这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各族人民的慈文”的这份珍贵礼物，从1945年以来曾以各种语言成百万册地印刷过许多版。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胜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提出一些新的理由，可用来为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和强求一致的作法辩解，但大战和斯大林自己的政策却引起了一些起着相反作用的因素，使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反法西斯战争大大加强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追求独立民族生活的愿望，还使他们对任何侵犯他们民族权利的行为都很敏感。共产党既然在反轴心国的斗争中起了作用，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苏醒过来的民族感情的感染，重新提出民族的目标。同时，斯大林那种实际上以保全“大同盟”为指针的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降低社会革命的目标，甚至完全停止提出这些目标。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各国共产党及其新党员队伍的政治态度中，“民族的”和“爱国的”因素占据了不寻常的比重（不应忘记，新党员很快就在各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中占了大多数），而且常常带有公开的民族主义色彩。

对“民族主义”的这种强调，从逻辑上说，就包含着同斯大林制订政策所依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之间发生矛盾的萌芽，但是，只要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这种结合还能够顺利地保持苏联和那些同希特勒作战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时，这个矛盾还是被掩盖着的。一旦共产党例如在中国、南斯拉夫、希腊那样，要把自己的民族愿望和革命目标结合起来，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革命的民族政策将给斯大林的伟大战略带来麻烦。

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而正式得到认可的各国共产党的“民族

化”，逐渐具有某些动摇斯大林的铁板一块的体系的特点。当时，所有的党（其中多数是忠诚的，也有少数是存心玩弄手腕的）都继续认为自己是受莫斯科领导的。它们并不怀疑苏共的领导作用和斯大林的一贯英明正确，但是由于事态发展的驱使，由于各国情势千差万别，它们也不得不按本身的利益行事，采取更多的主动。

不守纪律和“离经叛道”的头一批迹象出现了。中共表面上对斯大林要它和国民党达成协议的压力让步，实际上却继续坚持进行革命战争。1946年末，越共也开始了挣脱法国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这同样是和当时斯大林的政策相矛盾的。法共和意共则开始谈论它们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道路将不是苏维埃式的，而是法国式的或意大利式的。在美国，在党内拥有相当一批追随者的白劳德，公开投向改良主义，终于在1946年被革出教门。但是，最使斯大林心神不安的却是他的欧洲营垒中所发生的事故，特别是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

从解散共产国际到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这段时期中，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形势是复杂的、矛盾的。斯大林式的铁板一块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相辅相成，斯大林和苏共的威望和权威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但与此同时，离心倾向也开始增长，敌对态度也已出现，这都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磐石般的团结的威胁。1948年南斯拉夫的反叛，在斯大林铁板一块的世界结构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暴露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各国土生土长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的对抗的性质。从反叛的南斯拉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遭到的彻底孤立，可以看出这种铁板一块的结构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控制仍然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反对南斯拉夫“异端”的斗争，产生的效果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控制，一度还使这种控制具有更加咄咄逼人之势。

甚至在南斯拉夫事件发生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在大战中所形成的这种磐石般的团结，就已经经受了一次考验，它的来龙去脉是共产国际的老战士都较熟悉的。这就是1947年因反法西斯同盟发生危

机而引起的所谓“大转弯”。这次危机暴露了斯大林政策从1941年以来的全部机会主义实质——在国际范围内表现为对待“大同盟”的态度；在各国范围内，表现为大多数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可是，实行这次“大转弯”，并没有让各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一向奉行的政策，对大战的这个决定性阶段和随后阶段的形势，对战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等等问题，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讨论。一切都是由斯大林及其亲近的助手作出决定，然后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而并没有人对这种办事程序提出任何异议，也看不出对苏联的观点和指令稍有偏离的迹象。

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就是这批指令之一。共产主义运动一夜之间就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领导中心，而它本身对建立这个领导中心却根本没有参与。一切都是1947年在波兰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有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派的代表参加，并按照斯大林的意旨，建立了由这九个党组成的新机构。⁽⁸⁾甚至这些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都没有事先讨论过这次会议的议题——新的国际形势、在新形势下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及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等等。

在以后章节中，我们将对这次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共产主义运动新路线所引起的问题进行讨论。但在讨论之前，最好分析一下导致1947年“大转弯”的过程。我们得从波兰会议不得不加以讨论的问题开始，尽管那次讨论是掐头去尾的，回避了斯大林的政策这一主要之点，也不愿意公开承认问题的实质，即法国和意大利革命的遭受挫折。不过，即使是抱着半心半意的态度，波兰会议毕竟不得不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可避免地导致1947年局势的整个政治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同盟”所激起的美妙的幻觉烟消云散，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场冷战，想要在欧洲通过和平的、民主的、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希望，原来也纯粹是空想。

失败了 的 革 命 (法 国)

很明显，在1945年的情况下，苏联红军驻在易北河上，只要法、意两国已形成的“革命的可能性”得到实现，那就意味着革命将在欧洲大陆取得胜利，从而使世界力量的均势发生不利于美国这个唯一经过大战得到加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急剧变化。因此，这种革命可能性的受挫，对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和1918—1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后果相比，是不相上下的。

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11月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世界将会怎么样呢，如果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1919—20年，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冲击中没有半途而废的话？如果1918年德国、奥国的革命得到成功，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后，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话？”⁽⁹⁾这番话实际上对于1944—45年法、意革命的高潮也同样适用。季米特洛夫当然不会不把那些“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看作是使无产阶级革命冲击“半途而废”的原因。可是，现在又是谁在“半途”阻挡了1944—45年法、意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击呢？

当时，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而且不只是无产阶级，正如陶里亚蒂后来所说的那样：“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以及工人阶级之外的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都站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阶级政党一边。这一点使我国的形势也象法国一样，区别于其他西欧国家”。⁽¹⁰⁾换言之，在1944—45年之际，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停止前进，而它们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谁刹了车”，而在于“法共与意共的这种刹车行为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着眼究竟是否正当”？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这两个党在抵抗运动时期和解放时

期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一番分析，哪怕是浮光掠影的分析也好。现在我们就从法共开始吧！

苏德条约和法共

法共是以合法身份进入第二次大战的唯一共产党。它拥有30万党员，在工人阶级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是高举着反法西斯的旗帜参战的。希特勒德国，voilà L'ennemi！（这就是敌人）。党把谴责达拉第和法国右派的投降政策，作为反希特勒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极端反动的分子叫嚣要取缔共产党，因为他们把它视为同德国妥协的主要障碍。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苏德条约这颗炸弹突然爆炸了，法共领导人简直震惊得不知所措。（自然，斯大林并没有把别的国家哪怕是最直接受影响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放在心上。）法共领导立刻作出的反应是为这个条约开脱，说这是苏联维护和平的最大努力。不过，他们仍然充分支持加强国防，以抵御希特勒的侵略。1939年9月1日，法共议会党团一致宣布“全体共产党人都站到反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第一线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同一天，法共代表投票支持举借战债。^{〔1〕}

政府首先封闭了法共报纸，随即在9月26日取缔了法共本身。当时，资产阶级政党虽还没有一心一意准备投降，但它们实际上并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共只要继续坚持抵抗希特勒侵略的路线，并因此而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无能和背叛行为进行斗争，从而在自己的政策和苏联政策之间划清界限，本来是可以利用自己遭到的迫害来恢复它的影响的。

可是，法共很快就无条件地向莫斯科看齐。它刚刚宣布法国应该支持波兰，而且对政府为支持波兰可能进行干涉而要求举债作军费一事投赞成票之后，却又出尔反尔，宣布“地主阶级的波兰不值得支持”，而且还欢迎红军对波兰东部的占领。党还用类似的理由为苏联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辩护。本来这两次行动完全可以说成是

针对德国的军事措施，但法共领导却抄袭了苏联外交官们的掩人耳目的辞令。莫洛托夫把英、法说成是侵略国家，把德国说成是最具有和平诚意的国家。法共竟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尽管这样做不仅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而且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简直等于自杀。法共就是这样给了反动势力一个理想的借口，好让它来把自己打成背叛民族的政党。这使资产阶级得到双重好处：它既可以进一步孤立共产党，以便更易于进行镇压，又可以把自已的投降政策掩盖起来。

当民族陷入灾难，敌人的占领已经开始的时候，党依然坚持这种态度不变。它攻击维希政府，但自己并没有领导民族解放事业，也没有象南共、希共那样组织反法西斯民族革命战争。它把民族解放的旗帜拱手让给豪戴高乐那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在苏德条约期间，法共这种一味听命于莫斯科的盲从态度，最终使它处于极不利的情势之下：第一，使它未能利用法兰西国家刚刚开始崩溃时的有利时机，把民族情绪的洪流引导到革命的方向去；第二，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动权交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手中；第三，由于有上述两种因素，法共更易于遭到镇压。^{〔12〕}

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党在此阶段中，对资产阶级法国当时面临的空前危险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即一个革命政党所考虑的唯一办法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在1941年3月散发的一份题为《向法兰西人民致敬》的政策文件中，把当时一些无关紧要的斗争说成是在准备着“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战斗，通过这场战斗，将产生人民共和国，产生新的法兰西，一个免于资本家剥削的法兰西，一个全体人民都享有面包、自由与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法兰西”。但是，在希特勒军队占领下的法国，侈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号召进行解放战争，岂非笑话！可是党仍在暗示：只要坚持反对维希政府的斗争，就能从中产生出一个“人民政府”。这份文件只字不提怎样组织反占领者的斗争，却号召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士